

書 評

雷 家 聖*

茅海建著

《戊戌變法史事考》

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5 年元月，571 頁，ISBN 7-108-02195-1

一、全書大要

北京大學茅海建教授，於今年（2005）元月出版了《戊戌變法史事考》（以下簡稱茅書）一書。筆者曾撰有《力挽狂瀾：戊戌政變新探》（臺北：萬卷樓，2004 年 12 月）一書，對於戊戌變法的歷史稍有涉獵，承蒙茅教授惠贈大作，拜讀之後，深覺該書內容翔實，史料考據甚見功力，為研究戊戌變法相關課題的學者所不可不讀；然而茅書對於戊戌政變原因之解釋，則似乎尚有進一步解釋探討的空間，故草此篇，略述筆者之感想。

茅書分為五大部分。第一部分〈戊戌政變的時間、過程與原委—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、補證、修正〉，根據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、臺北故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等機構所藏之清宮檔案，對以往研究戊戌政變的各種說法，加以考證。證明在戊戌變法之時，慈禧太后已通過「事後報告制度」、「事前請示制度」得以掌握新政的內容；說明光緒二十四年（1898）八月初

* 作者係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。

Chia-sheng Lei is a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the Fo G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.



三日出現了政治權力的異常變動；並且證明在八月初五之時，光緒皇帝仍保有政治權力，確認八月初六為政變發生的時間。

第二部分〈戊戌年張之洞召京與沙市事件的處理〉：指出在光緒二十四年三月，湖廣總督張之洞奉旨來京面詢機宜，有可能轉任軍機大臣。卻因沙市發生燒毀日本領事住宅與郵局的事件，使得張之洞又返回湖北處理善後。沙市事件最後在懲兇、賠款、允許日本設立租界（沙市、福州）的條件下結案。若無沙市事件的發生，張之洞於百日維新前進京，維新事業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發展。

第三部分〈戊戌變法期間司員士民上書研究〉：指出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，光緒宣布「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，著由各堂官代奏；士民有上書言事者，著赴都察院呈遞」，放寬了官員士民上書的限制。這些上書多由新任的軍機四章京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、譚嗣同負責處理。但八月初三，清廷發生政治權力的變化，慈禧太后要求軍機處將官員士民上書的新政摺件都要「恭呈慈覽」，加強對新政的監控。這些中下級官員與士民的上書，激進、緩進、守舊的思想兼而有之，內容包括了指出制度上的各種缺失、提出設置議會的觀念、討論中學與西學的得失，以及鑄幣、財政、農業等各個方面。

第四部分〈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對外觀念的調適〉：指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之際，光緒皇帝力圖擺脫天朝觀念下的傳統外交模式，開始採行西方式的外交禮節，如接見德國亨利親王、為德國皇帝製作「寶星」（勳章）、購買世界地圖、親擬致日本的國書、接見伊藤博文、派遣赴韓使節等。

第五部分〈日本政府對於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〉：作者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檔案，認為日本駐華使館對於戊戌變法時期的新政內容，對外務省做了詳細的呈報，但是日本方面反應冷淡，沒有做出具體的指示與意見，一直到戊戌政變之後，日本政府的態度才有了大轉變，開始營救康有為、梁啟超，並向清廷關切光緒皇帝「廢立」的問題。

以下就茅書之中的重要內容與論點，略作分析及討論。

二、慈禧太后對新政的掌握與認識

我們一般對於戊戌政變的解釋，是採取「保守派」與「變法派」對立的



觀點，認為戊戌新政影響了保守派的利益，慈禧太后是在保守派官員的請求之下，才發動政變。可是，這種說法如今應該重新加以檢驗。茅書〈戊戌政變的時間、過程與原委—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、補證、修正〉一文，指出政變之前，慈禧對於新政的內容知之甚詳，政局的變化完全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之中。

茅書指出：光緒親政之後，慈禧仍然可以有效掌握朝廷的事務與皇帝的動向。其方式主要是一種「事後報告制度」，皇帝的硃批和早朝時的口諭，慈禧對此進行了監控。光緒親政之後，《隨手檔》中每天都有這樣的紀錄：「繕遞某某日硃批摺件事由單」、「繕遞某某日早事傳旨事由單」、「繕遞某某日電旨某道」。此中的「繕」，是軍機章京抄寫的意思；此中的「遞」，是上呈的意思。而這些由軍機章京每天抄寫的「硃批摺件事由單」、「早事傳旨事由單」、「電旨」是遞給慈禧的（頁11）。戊戌變法開始之後，這種「事後報告制度」也沒有中斷。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（陽曆6月11日），光緒下詔「更新國是」，是百日維新的起點，當天的「硃批摺件事由單」如下：

四月二十三日，廖壽豐奏解遞俄、法款銀摺，奉硃批：戶部知道；又奏副將湯鳴盛請留浙歸標補用片，奉硃批：著照所請，兵部知道；又奏解協黔餉銀片，奉硃批：戶部知道；又奏假滿病請開缺摺，奉硃批：著再賞假兩個月，毋庸開缺；又奏前安溪縣知縣戚揚學有根底請送部引見片，奉硃批：戚揚著交吏部帶領引見；又奏請將二十一年以前防軍報銷量免與扣平片，奉硃批：戶部知道；又奏上年分秋冬兩季釐捐數目摺，單一件，奉硃批：戶部知道，單并發。連順、德木楚克多爾濟奏查閱卡倫摺，奉硃批：該衙門知道。德木楚克多爾濟奏到任日期謝恩摺，奉硃批：知道了。（頁13）

茅書認為：當日收到的京外奏摺的題由及硃批，全都上呈慈禧了，慈禧從這些簡要的報告中，可以大體明瞭各地的政事政情及光緒的態度。

此外，茅書又指出：每天最重要的奏摺及相關諭旨，軍機大臣須在當天上呈慈禧。例如四月二十三日軍機處奏片：

本日中允黃思永奏息借華款請聽商民自相勸辦摺，又奏集貲設立勸農學堂請旨試辦摺，又奏辦理永清一帶水利片，又奏皖北賑捐請重定章程片，均奉旨：存。謹將原摺片恭呈慈覽。謹奏。（頁16）

茅書認為：據此奏片，被光緒皇帝「留」的黃思永奏摺，軍機處當天就將其



原件及光緒的處理意見上呈慈禧了。茅書並做了統計：從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五日，軍機處一共向慈禧上呈了摺、片、呈、書等共計 462 件。對此，茅書說明：名為歸政的慈禧可以看到百日維新的重要奏摺，包括軍機處都無法看到其內容的「留中」的摺件，基本上都送到了慈禧手中（頁 17-18）。茅書並將上呈慈禧的摺片做全面性的清查與整理，列於〈戊戌政變的時間、過程與原委——先前研究各說的認知、補證、修正〉之附錄一。

八月初，當伊藤博文抵華，「借才」之說甚囂塵上的時候，八月初三，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，說道：

風聞東洋故相依藤博文，即日到京，將專政柄。臣雖得自傳聞，然近來傳聞之言，其應如響。依藤果用，則祖宗所傳之天下，不啻拱手讓人。¹

這種激烈的言詞，促使慈禧在收到奏摺後，隨即在八月初四由頤和園返回紫禁城。茅書也從八月初三軍機處給慈禧的奏片中，看出了政治權力的異常：

本日陳兆文奏保舉人才片，奉明發諭旨一道。閔荷生奏請將會館改學堂片、耿道冲奏請設保險公司摺，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請清教案呈、宋汝淮條陳礦務河工呈，均簽擬辦法，恭呈慈覽，俟發下後，再行辦理。總理衙門代遞張元濟條陳摺一件、戶部代遞閔荷生、耿道冲條陳摺各一件、濮子潼條陳摺片各一件，均奉旨存。都察院代遞程格等摺呈，俟擬定辦法，再行簽呈慈覽。謹交陳兆文等各原摺、片、呈并昨日因應行鈔錄未及呈遞之孫家鼐、閻普通武、陳季同、金蓉鏡、暴翔雲、霍翔各原摺恭呈慈覽。謹奏。（頁 65）

茅書解釋道：光緒收到的奏摺分成兩類：有上奏權的衙門或官員的摺件，仍由光緒硃批、下旨；而沒有上奏權的司官士民之摺件，則交到軍機處進行「酌議」，提出處理意見後，再送光緒，有如內閣之「票擬」。而負責處理後一類摺件的，正是於七月二十日奉命「參預新政」的四名新任軍機章京楊銳、劉光第、林旭、譚嗣同（頁 70）。八月初三的政治權力的變化，是原來由軍機處簽擬意見而交光緒帝決定的司員士民的上書，從此移交到慈禧的手中。茅書並引用鄭孝胥八月初五日記中所記林旭之語：「上勢甚危，太后命新章京所簽諸件，今日悉呈太后覽之。」（頁 80-81）作為旁證。筆者以為，在「借才」的言論甚囂塵上的情形之下，慈禧對「不成熟的」中下階層官吏與一

1 楊崇伊，〈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〉，收於明清檔案館編，《戊戌變法檔案史料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初版），頁 461；茅書，頁 93。



般士民的上書，加強了監視與控制。但是，這與「政變」這種激烈的手段，似乎還有一大段距離。

三、政變過程的考證與原因之推論

慈禧八月初三受了楊崇伊奏摺的影響，於八月初四回到紫禁城。茅書根據內務府頤和園《雜錄檔》的記載：

八月初三日，總管宋進祿等為本月初四日聖母皇太后還西苑，所用引導、跟隨、關防官員人等照例派出，并所用牽騾甲人等照例預備。……於八月初六日還頤和園。所傳引導、跟隨車輛於是日寅初在福華門外預備。（頁86）

由此可見，八月初三慈禧決定次日（初四）回紫禁城西苑時，應該還沒有「政變」的打算，否則「政變」一旦啟動，慈禧就必須留在紫禁城中控制政局，不可能再回頤和園。慈禧將返回頤和園的日期訂在八月初六，我們可以推想，慈禧當時大概只是想要在光緒接見伊藤博文前後，對光緒加以告誡，不要對「借才」之事沖昏了頭，在紫禁城待兩天之後，將於初六返回頤和園。

不過，八月初五，情形有了變化。茅書引據內務府《雜錄檔》的記載：

八月初五日，總管宋進祿等為前傳本月初十日皇上前往頤和園去，所傳車輛、馬匹、蘇拉等改為福華門外，各該處照例預備。差首領膝進喜傳。（頁111）

茅書認為：此次決定與光緒同回頤和園，也就是說對光緒不再信任，要將光緒置於其身邊（頁113）。茅書因此提出疑問：「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見過光緒帝之後到初五日上午再見光緒帝之前，慈禧太后見過了什麼人？得到了什麼消息？……對此我不能做出答覆來。慈禧太后推遲回頤和園，是否意味著已決定訓政開始？對此，我也不能得出結論來。」（頁114）不過，茅書似乎認為推遲回頤和園即是政變的起點：「慈禧太后為什麼八月初五日決定將回頤和園的日期推遲到初十日、為什麼於初六日親政，對於我來說依然像謎一樣纏繞在心。」（頁163）可見茅書十分重視推遲回頤和園這件事，把此事當成一個「關鍵」或「轉捩點」。

對此，筆者則試圖做出具體的解釋：八月初五，即伊藤博文晉見光緒之



日，楊深秀上奏：

昨又聞英國牧師李提摩太，新從上海來京，為吾華遍籌勝算，亦云今日危局，非聯合英、美、日本，別無圖存之策。……況值日本伊藤博文遊歷在都，其人曾為東瀛名相，必深願聯結吾華，共求自保者也。未為借才之舉，先為借箸之籌。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，固結英、美、日本三國，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，誠天下蒼生之福矣。²

楊深秀請求光緒皇帝按照英國教士李提摩太（Timothy Richard）的提議，與伊藤「早定大計」，進行中美英日「合邦」。以慈禧對於新政奏摺掌握的程度，加上慈禧受楊崇伊奏摺的影響，相當重視「引用東人伊藤博文」的問題，慈禧「有能力」也「有意願」看到楊深秀奏摺，楊深秀這篇奏摺是逃不過慈禧法眼的。因此，慈禧知道了變法派的目標，不只僅有「借才」，還包括了「合邦」，情勢遠比楊崇伊所言嚴重得多，故決定於次日（初六）發動政變。

政變之後，慈禧也沒有完全打消「返回頤和園」的計畫，茅書指出：八月初九日，將原定初十日與光緒皇帝同回頤和園，改為十四日（頁 129）。八月十三日，也就是「六君子就義」的那天，慈禧決定，將原定十四日返回頤和園，推遲到二十日（頁 138）。到了八月十五日，慈禧才決定不再返回頤和園（頁 140）。為何慈禧在八月初六政變之後到八月十五日之前，還有返回頤和園的打算？茅書說：「從八月十三日到十五日，慈禧太后的旨意多變，最後決定不再回他頤養的頤和園，其中的原因為何，我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。」（頁 141）

筆者認為，「返回頤和園」的時程屢屢更改，和當時政局的變化有相當大的關係。筆者推測：八月初五日慈禧決定在初十日返回頤和園，這一現象似乎反映了慈禧對於再度訓政的作法仍有疑慮，慈禧一開始可能希望把事情作一處理之後，便返回頤和園。不過，問題卻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大，袁世凱向榮祿告密的內容傳到了北京，慈禧因而在八月初九日下令逮捕譚嗣同、楊銳、林旭、劉光第等軍機四章京，並將回頤和園的時間改為十四日。譚嗣同向袁世凱遊說政變，促使慈禧決定將四章京與康廣仁、楊深秀問斬，因此慈禧又決定將回頤和園的時間，推遲到二十日。但是，此後可能又擔心內部民心不穩，外有列強干預，於是返回頤和園的日期一再延後，到了十五日，慈

2 楊深秀，〈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〉，收於《戊戌變法檔案史料》，頁 15。



禧終於決定不再返回頤和園。因此，慈禧決心訓政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，最後在八月十五日下定最後的決心。

四、戊戌政變時期日本的角色

茅書在〈日本政府對戊戌變法的觀察與反應〉一文中，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檔案，認為日本駐華使館對於變法時期的新政內容，對外務省做了詳細的呈報，但是日本政府卻反應冷淡，沒有具體的指示與意見，一直到政變之後，日本政府的態度才有了大轉變，開始營救康有為、梁啟超，並向清廷關切光緒皇帝「廢立」的問題。

茅書的結論，與筆者《力挽狂瀾——戊戌政變新探》的結論大相逕庭。筆者認為日本政府在戊戌政變之前，即與「變法派」有密切的聯繫，日本公使矢野文雄曾經與康有為計畫召開「合邦大會議」。³變法開始後，更藉助康有為的影響力，利用伊藤博文訪華的機會，推行「借才」、「合邦」的計畫，企圖控制瓜分中國。除了前引的楊深秀八月初五的奏摺之外，康有為《自編年譜》也說在八月初三日「及夜，楊漪川（深秀）、宋芝棟（伯魯）、李孟符、王小航來慰。……（吾）以李提摩太交來瓜分圖，令諸公多覓人上摺。」⁴證明了楊深秀、宋伯魯主張「合邦」的奏摺，是有計畫的集體行動。宋伯魯在八月初六的奏摺中說道：

昨聞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，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，道其來意，並出示分割圖。渠之來也，擬聯合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及英國為合邦，共選通達時務、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，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，別練兵若干營，以資禦侮。……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、名震地球之重臣，如大學士李鴻章者，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，與之商酌辦法，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，必能轉禍為福，以保我宗社。⁵

宋伯魯已清楚說明「合邦」提議者為李提摩太。而李提摩太此一建議，很明顯是在誑騙變法派的官員，借「合邦」之名，讓中國交出權力，而由英、

3 康有為，《康南海自訂年譜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72），頁47。

4 同上註，頁67。

5 宋伯魯，〈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〉，收於《戊戌變法檔案史料》，頁170。



美、日等國所控制。宋伯魯並建議光緒派人和李提摩太、伊藤博文商酌辦法，這也證明了李提摩太、伊藤博文皆參與此一「合邦」計畫。伊藤博文為日本剛卸任的首相，其行為應可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與利益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確認日本政府在戊戌變法時期企圖推動「合邦」計畫，以達到控制瓜分中國的目的。

由於現在開放供學者查閱研究的外交檔案，都是經過「整理」過的檔案（世界各國皆然），大概很少有國家會把策劃他國政變的秘密資料，加以公開公布。而且，策劃他國政變的計畫，通常不會在一般駐外使館的例行報告中出現。因此，戊戌變法時期的日本駐華使館（公使矢野文雄除外）乃至日本外務省，不見得完全知道伊藤博文等人「借才」、「合邦」的計畫，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日本檔案之中沒有「借才」、「合邦」的內容，就認為當時不存在「借才」、「合邦」的計畫。畢竟，楊深秀、宋伯魯的奏摺，康有為的《自編年譜》，都清楚的呈現了「借才」、「合邦」計畫的輪廓，也證實了英國教士李提摩太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皆參與其事。

五、結 語

茅書在史料檔案的爬梳與整理上，工夫極深。但對於戊戌政變的原因，卻並未從眾多史料中，得出嶄新的結論，這是十分可惜的。

筆者認為，戊戌政變的真正原因，在於變法後期，尤其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之後，伊藤博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借戊戌變法的機會，遊說康有為等變法派官員接受其「借才」之提議，並利用變法派官員掌握決策核心的便利，意圖實行其「合邦」的陰謀。對於可能阻礙「借才」、「合邦」計畫的慈禧太后與榮祿，康有為、譚嗣同等人則打算利用袁世凱的軍隊「殺榮祿、兵圍頤和園」，加以剷除。慈禧太后是在明瞭當時險峻的情勢之後，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，解除了此一危機。現有的史料是可以支持這種說法的，而這些關鍵史料，在茅書回顧以往研究成果時，不難看到，但是卻難以推出結論，這是《戊戌變法史事考》一書的缺憾之處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仍然侷限於「保守派」、「改革派」二分法的成見，使得茅書希望找出保守派與慈禧太后勾結串連的證據，但又無所得，只能以「對於我來說依然像謎一樣纏繞在心」作為收場，這是此書美中不足之處。

